

第一章 秦汉王朝“岭南”地域结构中的合浦

岭南首先是自然地理的概念，指代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和海南岛，还包括越南北中部。岭南同时又是一个历史地理范畴，《晋书·地理志》称“秦始皇既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峽。时有五处，故曰五岭”。所谓五岭，即横亘两广北部与湖南、江西交界地区南岭山脉中的主要山岭，未必能够具体指实。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之后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郡，置交趾刺史，西汉岭南七郡基本就是秦代岭南三郡（南海、桂林、象郡）的范围。

第一节 地理空间结构

岭南地形以山地、丘陵和台地为主，缺乏面积较大的平原和盆地。区域内水系纵横，在主要江河的入海口形成地势平坦的三角洲，海岸线曲折漫长，岛屿众多，海南岛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

粤北以及粤桂交界地区主要是山地、丘陵，其中粤北山地是南岭的组成部分。桂西北及桂西地区的山地、丘陵海拔一般较高，雷州半岛以低山丘陵为主体地貌。岭南地区的山地多由花岗岩、红砂岩构成，易风化成丹霞地貌；广西及越南北部石灰岩分布广泛，往往形成岩溶地貌。

珠江三角洲面积约11000平方公里，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这两个三角洲河网纵横，土壤肥沃，是著名的农业耕作区。桂中岩溶丘陵与平原亦是重要农业区，其中郁江干流沿岸为岭南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

山地（包括丘陵、台地）与平原（包括三角洲、盆地），构成了岭南自然地理的第一组区域对应关系，沿海地带（包括雷州半岛、近海岛屿和海南岛）则与内陆腹地构成了岭南自然地理的第二组区域对应关系。

由西江、北江和东江三大支流汇集而成的珠江是岭南最大水系，流域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西江是珠江水系的主流，西江水系在梧州以上呈叶脉状分布，红水河、柳江汇流成黔江，左江、右江汇流成邕江，其下河段称郁江；黔江与郁江合流为浔江，再汇入桂江、贺江、北流江等，共同组成西江水系。珠江水系以外，粤东地区的榕江、梅江—韩江和越南北部的红河是独立的流域区。在广西和粤西的南部沿海地区，还有钦江、南流江等较小江河独流入海。在桂东北地区，灌江、海洋河组成湘江上源，汇入长江水系。

就水系而言，西江干流—珠江流域、西江上流的郁江—浔江流域、郁江上流的左右江流域、西江支流的漓江—桂江流域和贺江流域以及湘江上源流域、北江上游流域、元江—

红河及其附近的马江、大江流域、桂东南—粤东沿海地区诸独流江河（以流经合浦地区的南流江最为典型）、榕江流域和梅江—韩江流域、黔江及其支流融江—柳江和红水河（及其上流南、北盘江）流域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这些地理单元大致可以与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相对应，范围略超出秦汉岭南的地域范畴。

南流江发源于大容山南麓，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北流市、玉州区、博白县、浦北县，在合浦境内分为南干江等四条河汊注入廉州湾，全长 287 公里，流域面积 9439 平方公里。南流江是桂东南独流入海的较大江河，经北流江可以联系西江中游的浔江河段，自浔江北上桂江—漓江—灵渠—湘江一线，是中原进出北部湾最为便捷的通道。

南流江至合浦县石康镇多葛村分出西门江一支，流经合浦县城西面，与南流江干流分别入海。南流江与西门江之间是南流江沿岸平原的主要部分，其中县城西南侧沙岗镇的白沙江至廉州镇的望州岭一线以北属河流冲击平原，合浦汉墓即主要处于此河流冲击平原上^[1]。

第二节 行政空间结构

西汉岭南七郡，以及以广西西部为主体范围的西汉象郡所在是秦汉岭南的基本地域范围。在此基本地域内外，郡级以上行政机构设置情况存在以下情况：

第一，若干行政设置跨南岭而治。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根据“犬牙相入”的行政区划设置原则，在桂东北方向于分长沙国南部桂阳郡一部和南越国西北一部设置零陵郡。零陵郡治零陵故城即今广西全州县南部的城子山城址^[2]。南越国北部的含涯、浚阳、曲江三县（英德、曲江一带）归属岭北的桂阳郡^[3]，桂阳郡郡治在今湖南郴州。

第二，若干行政设置有废并。

在海南岛方向，武帝元封年间（前 110 年—前 105 年）置珠崖、儋耳两郡，昭帝始元五年（前 82 年）儋耳并入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前 46 年）废珠崖郡。在桂西方向，“（元凤）五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4]。汪宁生认为西汉牂牁郡包括今天贵州乌江以南、云南红河州、文山州和曲靖地区的一部分以及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一部分^[5]，南接交趾郡、东接郁林郡。

第三，若干行政设置为遥领、虚封或羁縻。

秦帝国在岭南地区推行不同于内地的郡县制度，“南海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6]。西汉朝廷虚授岭南三郡给吴氏长沙国，而南越国实际自立，刘瑞更认为南越国与汉王朝是两个政权之间发生的“外臣”关系^[7]。今广西境内湘桂铁路以西区域尚未有汉城发现，李珍推测“桂西地区的汉县虽然有县之名，却无县之实，大部分县形同虚设，也就没有建筑作为县级住地的城池，而且在这地区的一系列考古活动中，到目前为止很少发现

秦汉时期的建筑遗迹、墓葬和遗物，这就是明证”^[8]。

第四，岭南政治中心发生较大范围的转移。

南越国灭亡后番禺下降为南海郡治，交趾刺史常驻龙编（今越南北宁）；东汉设置的交州刺史治在广信（今广西梧州），东汉末年（建安十五年，210年）移治番禺。岭南汉代政治中心在番禺、龙编、广信之间的转移，与岭南七郡的二元结构有关——西江—珠江流域的南海、苍梧、郁林三郡与环北部湾的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各自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单元。东吴时期由于经济开发、北部湾近海交通线变更、岭南东部地区治理强化等原因^[9]，黄武五年（226年）分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最终形成交、广分治的行政格局。

综合考虑行族群和人文民俗背景在行政设置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将秦汉时代岭南地区的行政空间设置分为以下情况：

第一，秦汉帝国在岭南的实质统治区，主要是汉代岭南七郡的范围，其中又分为两大板块。岭南北部、东部，即自西江上游诸支流（漓江—桂江、贺江、郁江—浔江）至西江干流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北江和东江中下游地区，属于南海、苍梧、郁林和零陵郡范围，为一个板块。岭南西部、南部，即环北部湾沿岸以及濒临中国南海西岸的越南中部地区，属于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范围，为另一个社会文化板块。

第二，桂东北的零陵郡范围。零陵郡下的洮阳县战国时期已是楚国南境的城邑关戍（“鄂君启节”有楚国商船“庚洮阳”的记载）。西汉初年洮阳县属吴氏长沙国（马王堆 M3 出土的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上标出“洮阳”），元朔五年（前124年）封长沙定王发之子狩燕为洮阳靖侯^[10]。这一地区是楚汉文化进入岭南的桥头堡，与岭北地区关系更为密切，长沙汉墓出土文景时期的“洮阳令印”、“洮阳长印”、“洮阳丞印”可为一证^[11]。

第三，桂西大部、粤东一部以及海南岛，还包括前述秦汉帝国实质统治区内两大板块中间的粤西—桂东山地（云雾大山、云开大山、十万大山一带），基本为土著部族占据，大致与南越国和西汉王朝保持羁縻关系。粤西—桂东山地的未开发状态过去很少引起注意，东吴时期设置合浦北部都尉，显然是为了重点经略这一地区。刘宋泰始年间（465年—471年）在合浦北部立越州，胡守为推测“越州多夷僚，瘴疠又重，有一定的特殊性，恐怕这才是越州建立的主要原因”^[12]。

就合浦地区而言，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亡南越国后设合浦郡，辖高凉、临允、徐闻、朱卢和合浦五县（王莽改合浦郡为桓合郡，合浦县为桓亭县，旋即恢复旧名）。东汉末年孙吴政权控制岭南，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分合浦郡置高凉郡，境域包括今北海、钦州、玉林、廉江等市的全部或一部分。合浦地区的行政设置当在上述第一种、第三种情况的背景下考察。

第三节 族群空间结构

岭南秦汉时期的族群空间结构以秦定岭南、南越国除、两汉交替形成若干时间节点，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结构，而以南越国时期和西汉统一这两个阶段最为重要。岭南地区秦汉时代的族群集团主要分为越人和次生越人一土著汉人两个系统。

战国晚期岭南地区的土著居民大多属于百越支系，《史记·货殖列传》称“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传统观点认为，西瓯主要分布今天桂江流域、西江中游，相当于汉代苍梧郡和郁林郡的大部地区；骆越活动区域包括今天左江流域、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海南岛和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相当于汉代郁林、珠崖、交趾、九真等郡。

与传统认识不尽一致，我们以为珠江三角洲一带（相当于汉代南海郡）的百越集团可以称为南越，这支越人文化比较进步，与江浙方向的越人联系比较密切。至于西瓯，战国晚期的分布区当在邕江—郁江流域（即汉代郁林郡范围），秦定岭南后逐渐向南退却至粤西—桂东山地，东汉三国时期与其他百越支系共同发展成为獠僚、乌浒之属。湘东北、桂东北和粤西北方向的百越集团属于苍梧（以汉代零陵郡为中心），南越国以来趋于消亡。

战国时期分布在左、右江流域的所谓“骆越”，实际应该单称为“骆”，越南北部地区原来也是骆人居住区。随着南越国的拓展，部分骆人集团和部分西瓯集团向越南北部方向退却，东汉时期在交趾郡、九真郡一带形成骆越集团。骆人其实属于西南夷中的百濮，也是越人。江应樾认为南方民族史中的濮就是越，“在楚的南方地带，有时称为‘濮地’，有时又称为‘越地’；住在那里的人民，可以称‘濮’，也可以称‘越’。……大概战国以前，称濮者多，战国以后，就通称为百越了”^[13]；尤中认为“僚”即是“雒”的音转，夜郎境内的濮、僚以及且兰、句町、漏卧等均为百越支系^[14]。

在南越国腹心地区，即后来西汉帝国的实质性统治区的北部、东部这一板块，土著居民受到自岭北南下的楚、秦、汉人的强烈影响，可以称为“次生越人”；汉平南越以后的西汉中后期，“次生越人”逐渐发展为土著汉人^[15]。

东汉以后，岭南地区汉人的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但是各主要族群的基础分布格局未见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以粤西—桂东山地为中心出现獠、僚、乌浒之属。獠人见于东汉初年，如“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内属，封为汉里君”^[16]，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17]。俚人是西瓯、骆越的后裔，主体成分可能是骆越^[18]。

关于獠人的分布区域，晋张华《博物志》称“交州夷名俚子”，三国吴万震《南洲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冯孟钦根据信宜马岭岗、亚公山、高州大潮干头墩、廉江青平鲤鱼

怜等地的考古发掘材料，认为考古学上的俚人文化主要表现为瓮棺葬、狭长船形土坑墓、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最有特色的陶器是内耳釜、提梁壶、甑和宽平折沿罐。这些曾经以为是东汉遗存^[19]的材料现在判断年代约在晋唐时期，但是对我们追溯东汉俚人遗存仍然有重要启发。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俚人分布区，大致即是包括合浦在内的古高凉地区。

[1] 参见谭玉华：《合浦汉墓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4年。

[2] 李珍、覃玉东：《广西汉代城址初探》，《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传》。

[4] 《汉书·昭帝纪》。

[5] 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

[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7] 刘瑞：《南越国非汉之诸侯国论》，《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李珍、覃玉东：《广西汉代城址初探》，《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9] 段塔丽：《试论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0] 《汉书·王子侯表》。

[11] 蒋廷瑜：《广西最早的县——洮阳》，《学术论坛》1981年第6期。

[12]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 江应樑：《说“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14] 尤中：《汉晋时期的“西南夷”》，《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15]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16] 《后汉书·南蛮传》。此事件《后汉书·马援传》记为“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

[17] 《后汉书·南蛮传》。

[18] 练铭志：《试论广东俚汉民族关系》，《中国民族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9] 冯孟钦：《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百越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